

中苏外交关系研究 (1931 ~ 1945)

罗志刚 著

国际体系失衡下的中苏外交关系，是亚太地区主要国家外交战略和政策交相作用之产物，经历了一段极其曲折而富有戏剧性变化的道路。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WUHAN UNIVERSITY ACADEMIC LIBRARY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大学图书馆

1102109

D829.512
12

DG78/20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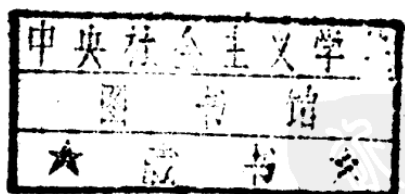
中苏外交关系研究

(1931—1945)

罗志刚 著



201021090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苏外交关系研究:1931—1945/罗志刚著.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2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课题)

ISBN 7-307-02687-2

I. 中… II. 罗… III. 中苏关系—国际关系史—1931
~1945 IV. D829.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6802 号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湖北省黄冈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436100 湖北省黄冈市八一路 59 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1999 年 2 月第 1 版 199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插页:5

字数:274 千字 印数:1—1000

ISBN 7-307-02687-2/D·389 定价:17.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武汉大学学术丛书
编委会

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
委员

侯杰昌

卓仁禧 张清明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俊萍 王吉玉 王维克

田德诚 朱英国 刘花元

江 春 李文鑫 余劲松

冻国栋 张清明 陈恕祥

杨弘远 卓仁禧 周茂荣

郑传寅 胡树祥 胡德坤

查全性 侯杰昌 郭齐勇

陶德麟 彭斐章 熊玉莲



罗志刚 1946年生，湖北武汉市人。197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1984-1986年赴南斯拉夫进修研究。现任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现代国际关系研究，主要著述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抵抗运动》（独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纲》（两主编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世界性社会进步》（两主编之一）、《20世纪世界史》（合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合著）等8部专著，另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近30篇。

序 言

综观几个世纪以来的全部中俄（苏）关系史，应该说，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是其中一个别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国际关系史上更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总的来看，以结盟为基本性质的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有利于中国坚持抗日战争并取得胜利，也为苏联胜利进行卫国战争和反法西斯联盟国家实现“先欧后亚”的总战略方针提供了必要的保证。由于两国战时关系的意义超出了远东范围，在于影响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的发展，这种关系不仅在当时就受到国内外不同阵营人士的广泛密切注意，而且在战后数十年间一直引发着人们的浓厚兴趣，因此至今仍是一个比较受重视的研究对象。更要看到，随着近年来俄罗斯、中国和西方国家公布的外交文献和公开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愈来愈多，人们对战时中苏关系进行系统深入的再探讨，已有了更加方便的条件和更大的可能。

当前，世界形势呈现许多新的变化，特别是国际社会进入了全球化的历史新阶段，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整个时代的主旋律。而国家之间的关系在日臻密切的同时，也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错综微妙，令人难以把握。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希望善处国际关系，为本身发展创造理想的有利外部环境的国家，就更有必要对近代以来尤其是本世纪的国际关系重新进行反思和探讨，以便从中获得丰富的教益和新的启迪，更加懂得要在什么样的外交原则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国际体系大厦，改善国际关系，使之朝着民主化、健康化的方向发展。由此可知，我们今天在新形势下重新研

究半个世纪之前的那段不平凡时期的中苏关系有了新的动力、新的意义。

本书系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的“八五”规划重点研究课题“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研究”的部分成果，是一部探讨抗日战争时期中苏关系问题的学术专著。主要目的在于：一、尽可能真实地反映战时中苏关系的基本面貌，中苏同盟的发展特点、实质及作用，说明每个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时，应该正确处理好国家利益和不同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本国利益和其他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之间的关系。二、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阐述中苏双方的外交战略，评价其得失利弊，为人们更好地研究战时中苏关系提供一定的参考意见。三、从一个侧面反映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的艰苦性，以及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与重大贡献。四、阐明美国对战时中苏关系发展演变的影响与作用。

全书是在以中日关系和整个国际形势为背景，以中苏外交关系的走势为主线，以国家利益为原动力来解释有关国家国际行为的基础上展开论述的。在此框架之下，笔者以宏观分析和微观分析相结合为基本研究方法，从中国、苏联和其他国际因素的外交战略与政策这三个层面研究入手，揭示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着重分析抗日战争时期中苏关系发展演变的动因、意义以及深远影响。

本书不打算事实上也不可能毫不遗漏地从各个方面来论述这一时期的中苏关系。它主要反映的是两国政府之间的外交往来及其影响下的政治经济关系，尤其是政治关系。因此，严格地说，这是一部抗战时期的中苏外交史。

本书第一、二、三章主要是探讨中国和苏联是如何捐弃前嫌，重归于好和走上联合对日道路的；第四、五章说明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初期，苏联给予了中国宝贵的巨大援助，而中国也尽其所能地从各方面支持了苏联的反法西斯斗争；第六、七章着

重分析了中苏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以及恶化时期两国关系的特征；第八、九章主要说明美国出于自身的战略利益考虑，积极地直接干预中苏关系，从而成为影响大战末期这一关系发展的最重要的国际因素。

本人在撰写过程中，围绕课题尽最大努力搜集和利用了一部分有关的中外文资料，特别是中国、苏联和美国在战后披露和公布的当时外交文献。自不待言，一些政治家和专业研究人员发表的具有参考价值的著作，一些不乏真知灼见的学术观点，也使我获益匪浅，深受启迪。我周围的同仁对本书的写作自始至终给予了热情的关心和真诚的支持。他们同我一起讨论书中涉及到的一些有争议的或比较重要的问题，为我提供参考书和资料，还对初稿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视的修改意见。几年来，除了北京图书馆、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外，武汉大学图书馆、政治与行政学院和历史系的资料工作人员也为我完成此书提供了诸多方便。武汉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张俊超同志一直和我保持着工作上的联系，为本书的出版更是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在此脱稿付梓之际，对于以上各方面人士的帮助与支持，谨在此一并致谢。同时，必须说明的是，由于本人学识与水平有限，书中难免疏漏不当之处，敬祈学界同仁教正。

罗志刚

1998年8月于武昌珞珈山

目 录

序 言

引 论	1
-----------	---

第一章 中苏复交	19
----------------	----

第一节 “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在中立政策下的双重

外交	19
----------	----

一、苏联宣布采取“不干涉”立场	19
-----------------------	----

二、苏联谋求对日关系的改善	26
---------------------	----

三、苏联建议中苏复交	30
------------------	----

第二节 国民政府对苏联复交建议的反应	33
--------------------------	----

一、冷漠原因	33
--------------	----

二、被迫转上中苏复交之路	38
--------------------	----

三、中苏复交	46
--------------	----

第二章 中苏关系的缓慢改善	51
---------------------	----

第一节 中苏关系处于“休眠”状态	51
------------------------	----

一、复交后的中苏新接触	51
-------------------	----

二、国民政府政略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56
------------------------	----

三、苏联远东外交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62
------------------------	----

第二节 中苏关系走向改善	68
--------------------	----

一、中苏关系沉寂局面的打破	68
---------------------	----

二、国民政府着手改善中苏关系的原因	71
-------------------------	----

三、苏联倾向加强中苏关系的原因	78
第三节 复交后的中苏贸易	81
第三章 中苏探寻联合抗日途径	87
第一节 中苏缔约谈判	87
一、缔约谈判帷幕的拉开	87
二、《苏蒙互助议定书》对中苏谈判的冲击	92
三、中苏之间的严重分歧	95
四、“西安事变”与苏联	99
第二节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106
一、“七·七”事变推动中苏联合抗日	106
二、谈判新进展	110
三、《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	114
第四章 苏联援华抗日	121
第一节 苏联对中国的政治支持	121
第二节 苏联对中国的军事贷款援助	127
第三节 苏联对中国的军事物资援助	135
一、援助规模	135
二、物资援助的作用	143
第四节 苏联派遣军事人员援华抗日	144
第五节 苏联援华抗日政策的国际反应	152
一、日本的反应	152
二、德国的反应与陶德曼调停	154
三、美国的反应	161
第五章 中国对苏联反法西斯斗争的支持	167
第一节 中国对苏联反法西斯斗争的直接支持	167
第二节 中国抗日战争是日本“北进”计划失败的	

关键因素之一·····	174
第六章 中苏合作对日道路上的分歧与矛盾·····	182
第一节 苏联拒绝参加对日作战·····	182
第二节 苏联反对国民党破坏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1
第三节 苏芬战争和中苏关系“风波”·····	198
第四节 《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和中苏矛盾的加深·····	205
第七章 中苏关系的恶化·····	215
第一节 中苏关系冷淡和恶化的深层原因·····	215
第二节 苏联减少和停止援华·····	218
第三节 美国大力加强援华·····	222
第四节 新疆问题·····	225
一、盛世才决定“转向”和中苏关系开始恶化·····	225
二、蒋盛合谋反苏反共·····	231
三、苏联势力退出新疆及其原因·····	235
第五节 苏联对国民政府的回击·····	239
一、苏联在新疆的报复·····	239
二、唐努乌梁海并入苏联版图·····	240
三、苏联严谴国民党推行反共政策·····	242
第六节 国民政府反对苏联参加对日作战企图失败·····	246
第八章 美国和中苏关系的改善·····	251
第一节 美国直接介入中苏关系的动因·····	251
第二节 美国的斡旋·····	261
一、美国对国民政府的“规劝”·····	261
二、国民政府接受美国调解的原因·····	266
三、美国建议苏联支持蒋介石·····	269
第三节 中苏关系走出恶化低谷·····	271

一、国民政府缓和中苏关系的措施	271
二、苏联在中国问题上的新态度	272
第九章 中苏关系的重塑	279
第一节 美苏协调远东军事战略与《雅尔塔协定》	279
一、美苏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的交涉	279
二、《雅尔塔协定》的签订及其评价	283
第二节 1945 年的中苏谈判	291
一、中苏谈判前的中美交涉	291
二、第一阶段的中苏谈判	295
三、美国决定干预中苏谈判	304
第三节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缔结与评价	310
一、条约的缔结	310
二、谈判成功原因分析	315
三、条约的评价	319
主要参考资料目录	323

引 论

任何国际关系方面的著作，总是在反复选择的基础上，就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业已发生的重大国际关系问题、现象进行评述，总是反映着一段特定时期、特定范围内的国际关系的基本特点及面貌。与此相类似，本书则是以那段距今并不十分遥远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苏关系问题为特定研究对象，反映的是这种关系的基本特点及面貌。回想起来，该时期的中苏关系只是世界历史上一个极其不寻常背景下的产物。如果不是德意日法西斯给人类带来空前无比的战争浩劫，中国、苏联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独立与安全因此受到严重的威胁，中苏关系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里，走出 1929 年的断交低谷，迅速修复、改善并登上联合对日高峰，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诚然，在中苏合作的道路上，两国风雨同舟，患难相扶，有过关系空前融洽友好的时候，也出现过关系冷漠和恶化的痛心局面。但总的来说，由于中苏在战略上是一种利害相关、相互依存的关系，双方大体上能够求同存异，保持合作，而都不愿让乌云久久笼罩在相互关系之上。就结果而论，无论是中国对苏外交，还是苏联对华外交，都是比较成功的，两国都通过联盟新关系的建立，获得了促进各自对日战略目标实现的有利条件。至于苏联，由于在战争末期洗刷了日俄战争（1904～1905 年）失败之耻，重新取得在中国东北的权益，竟还有一份额外的收获。鉴于这一点，不妨认为苏联是一个比中国更大的赢家。言及至此，尽管我们无意因苏联损害中国权益的行动否定其大力援华抗日的重

大作用，但也有必要指出，战争末期把中苏关系推向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签订，无疑大大伤害了相互关系，抵消了一部分苏联参战对加速大战胜利结束所具有的积极意义。

比较全面地把握和揭示所述时期中苏关系的特点，是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通过研究，这些特点逐渐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为便于进一步探讨起见，现就其中荦荦大端者作一些简要的分析和说明。

（一）国家利益是中国和苏联制定外交政策、处理相互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和依据，是中苏同盟关系建立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国家利益是一个内涵十分复杂的概念，是一个有形的和无形的综合体，就其本质而言，是国家有关安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影响力的整体生存和发展利益。它作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的决定性的条件与因素，对于每个国家而言，不仅是客观存在的，也是它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依据。在国际关系中，各国普遍是以维护和谋求本国国家利益为其基本目的与行动准则；国与国之间的分离聚合、亲疏冷热的复杂关系，也主要是由各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决定的。因此又可以说，国家利益是国际力量分化组合、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直接动因和决定性力量。

抗日战争时期，苏联正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主要是安全利益为基准，采取一种非常现实的态度，来制定对外政策，处理同中国的关系的。苏联由于在地理上、历史上、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欧洲国家皆有复杂密切之关系，一向以欧洲为利益重心，但也重视自己在亚洲的利益。抗战初期，在德日法西斯侵略的两面巨大威胁之下，它为了利用中国抗战牵制日本，保证自己的远东边境安全以便全力西顾，制定了“援华制日”的远东战略，顶住日本的外交军事压力向中国提供援助，从而为中苏合作关系的建立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大战后期，苏德战场形势的根本好

转，苏联军事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其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思想再度抬头，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战后远东利益，苏联利用美国希望它对日出兵的强烈心理，提出了不惜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参战政治条件，最后竟伙同美英对中国进行了势力范围的划分。它在抗战前期的援华抗战和大战后期参与划分中国势力范围的做法，对中国国家利益所起的作用是完全相反的，前一种做法有益于保障中国的国家利益，后一种做法无疑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但是，这两种做法对苏联国家利益却都是有意义的，所起的作用是前后一致的。区别仅仅在于：前一种做法所追求的保护的是苏联正当的安全利益，后一种做法所追求的并得以实现的是苏联不正当的扩张利益。总之，抗战时期苏联对华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最大限度地赢得和维护苏联的国家利益，尽管具体情况有所不同。

中国的对苏政策和对外关系的处理，是经过一条曲折反复的道路，但也体现出主要是以国家利益也就是安全利益为其根本出发点的。“九·一八”事变后，远东国际形势顿时变得异常复杂。为了利用中苏关系的改善以减少日本帝国主义扩大侵华行动的可能性，国民政府在经过一年多的犹豫之后，于1932年底始下决心，使中国和苏联恢复了邦交。此后，由于蒋介石推行错误的、反动的国内外政策，一心指靠西方大国和国际联盟（以下简称“国联”）出面帮助缓解远东冲突，把反共置于抗日事业之上，中国痛失一段和苏联加强改善关系的宝贵时间。“七·七”事变前后，面对中日矛盾急剧激化、中国的独立和安全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严重威胁和破坏，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坚决要求抗战的强烈呼声的压力下，又被迫调整对苏政策，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建立了非正式的联盟关系，以争取它为中国抗战提供极其必要的军事援助。这样，在30年代的资本主义世界中，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率先越过意识形态不同的障碍，和社会主义苏联建立了真正合作打击法西斯战争势力的联盟关系。这种联苏政策，首先符

合中国国家生存利益的现实需要，同时也有利于蒋介石集团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地位。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修改外交方针，迅速疏远苏联，转而以美国为主要援依靠对象即中国国家利益的主要保护者。大战末期，由于美国的外交压力和蒋介石企图阻止苏联在战后支持中共推翻国民党统治，国民政府以牺牲中国领土权益为代价，缔结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种缔约行动主要是受了国民党一党私利的驱动，明显损害了中国国家利益，但也有战后远东安全方面的考虑。换言之，缔约行动在一定程度上含有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目的。

以上说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和苏联在制定、调整对外政策，处理相互关系的过程中，基本上都能以国家安全利益为重，未把双方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置于首位。然而，这种差异毕竟是客观存在着的，对中苏关系不能不发生影响。其表现是，国民党统治集团在联苏期间，始终对苏抱有猜疑、不信任的态度，根本谈不上消除过去长期形成的仇苏心理；而苏联对国民党统治集团也远非完全信赖，蒋介石对中共的压制行动，则使苏联更加看清了他的反共本性。这一切又构成了战时中苏之间摩擦与冲突的一个根源。当然，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的制约下，对中苏关系来说，意识形态上的差异难以产生太大的影响，最终要让位于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因为日本法西斯这一共同敌人的存在，决定了中苏之间的共同利害关系，使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因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愚蠢地彻底中断彼此之间的合作关系，致使本国的安全利益受到损害。这也就是说，作为国家利益重要构成部分之一的意识形态利益，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苏联，都未能取代国家安全利益在对外政策中的首要地位和决定性作用。

抗战时期中苏顺应国家利益需要而进行的成功合作的事实，证明了世界上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合作是可行的，并且是行之有效的，也证明了现代国际舞台上的两大民主进

步力量即社会主义力量和民族解放运动力量有着共同的利益，应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奴役政策和霸权的斗争中结成紧密的统一阵线。

(二) 中国共产党和国内各种社会进步力量是中苏关系发展的积极推动者。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中国各种社会进步力量就极力推动北京政府同苏俄建交，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24年达到了这一目的，从而为早期中苏关系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架设了重要的桥梁。30年代初，早就抱有称霸亚洲野心的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略中国，给中华民族的独立和生存造成空前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危及到苏联的国家安全。因此，中苏两国人民都希望实现相互合作，增进团结，以共同力量制止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势力的扩张。由于中国人民是日本侵略的直接对象、最大的受害者，对社会主义苏联又一直抱有信任的态度，他们更是不遗余力地推动两国改善关系。1932年底中苏邦交的恢复和他们的这种努力是分不开的。此后，中国的一切进步力量不断对国民政府施加影响，促使它进一步改善中苏关系，争取两国能够共同对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为保证抗日战争赢得胜利，坚持主张和苏联实现最紧密的合作，并对苏联支持中国抗日表示了高度的信任。毛泽东在1937年7月23日的《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一文中谈到抗日的外交时鲜明指出：“立刻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①1939年，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中国的敌人是世界性的敌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而不是孤立的抗战，因此，在“伟大抗战中，基本的依靠中国自力胜敌”，但同时也需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外交文选》，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